

东汉以前的匈奴族

林 幹

一 匈奴族的兴起及其社会面貌

匈奴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游牧部族，它于公元前三世纪前后（战国时期）兴起于大漠南北。在它兴起以前，这个地区已先后出现过夏代的“荤粥”（音xūn yǔ），殷商时的“鬼方”，西周时的“玁狁”，春秋战国时的“戎”、“狄”及后来的“胡”。国内外都有学者主张匈奴的族源与上述“荤粥”、“玁狁”等有一定的关系，在战国及秦汉时期，“胡”字更成为匈奴的专称。

匈奴是游牧部族，它的社会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匈奴人为了追逐水草，经常四处迁徙。他们住穹庐（毡制的帐幕），食畜肉、乳浆、干酪，衣皮革、毡裘。

畜群（马、牛、羊）的生产十分繁盛。史载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曾以四十万骑兵围刘邦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始以一兵一骑计之，战马已达四十万匹^①（事实上，游牧民族通常一兵不止一骑）。公元前127年，汉将卫青出击匈奴，在“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盟一带）捕获其牛羊百余万头^②。这样的例子，史书记载还有，可见当时匈奴的畜牧业之发达。

在匈奴人的经济生活中，狩猎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后来由于畜牧业的发达，猎获物已经不是匈奴人的主要生活资料，因此狩猎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便逐渐下降。

农业在匈奴人的社会经济中也有一定的地位。《史记·骠骑列传》载：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出击匈奴，至真颜山（寔音tián）赵信城。（约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

爱山南面支脉附近），获得匈奴储存的大量粟米。《汉书·匈奴传》曾记载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匈奴地区因为连续下雨、雪数月而“谷稼不熟”。此外还记载昭帝始元四年（前83年），卫律为单于计谋，打算筑城、建楼以储存谷物，准备坚守漠北，与汉朝作长期的抵抗。

匈奴人有自己的手工业，其中最重要的是冶铁业，从近数十年来国内外的匈奴考古资料中，特别是从漠北的诺颜山（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北七十英里处，当时属单于庭辖境）匈奴古墓的出土物中，发现有三角形铁镞、长柄铁矢、铁刀、铁剑、铁马嚼、大小铁环、铁片、铁屑、铁钉及其它铁器。这都是属于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及公元前三至二世纪的匈奴遗物^③。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东南的桃红巴拉村匈奴墓葬的出土物中，也发现了铁刀和其他铁器^④。

所有这些出土文物，都可证明匈奴人自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已经有了铁器，公元前三世纪以后开始广泛地使用铁器，并建立了自己的冶铁手工业，公元前二世纪以后冶铁业更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情况。

其次是铸铜业。从诺颜山、内蒙古及其它地区的匈奴墓葬出土了大批的铜镞、铜刀、

①② 参阅《史记·匈奴列传》。

③ 凡本文提到的匈奴出土文物，除另注明出处外，均见拙编《匈奴史论文选集》（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1977年版）关于国内外匈奴考古情况的介绍。

④ 参阅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一文，见《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铜剑、铜马嚼及其它铜制日用器皿和饰具等，可以看出其生产规模和技术，说明了匈奴人的铸铜业早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

另一个手工业部门是制陶业。诸颜山等地的匈奴墓葬都出土了大批的体积不等、形状和色泽不一的各种各样的陶器，可见陶器制造也早已相当发达了。

此外还有皮革制造业和木器制造业等。其中制造车辆更反映了木器和金属器互相结合使用的技能。《盐铁论·散不足》篇提到的“胡车相随而鸣”的“胡车”就是匈奴车。匈奴人在与汉张掖郡（今甘肃张掖县一带）交错的地区还有专门制造车辆的工场。故匈奴人拥有的车辆特别多，往往在作战时，一次损失，为数就达千辆以上^①。

匈奴人为了生产上和生活的需要（上层贵族还需要奢侈品），经常把他们的牲畜和皮毛与汉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行交换。故匈奴人十分重视与汉人互通“关市”。通过关市，汉匈之间长期发生了频繁而大宗的交换。

二 匈奴人的文化

匈奴人虽然没有文字，但民歌却优美动人。《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西河旧事》云：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郡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亦百里，生长松柏等木材，水草丰盛，冬温夏凉，宜于畜牧；匈奴失此二山（还有燕支山）乃歌曰：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匈奴人有自己的音乐，最广泛流行的乐器是胡笳和鞞鼓（鞞音bì）。在匈奴生活了十二年的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②中说：“胡笳本自出胡中”（第十八拍）；又说：“鞞鼓喧兮从夜达明”（第三拍）。

匈奴人的艺术，在题材上明显地反映出他们长期的游牧生活和狩猎生活。故在他们的艺术品中，动物形或动物画最为普遍。这类艺术品在诸颜山匈奴墓葬及我国内蒙古和林格尔的范家窑子、察右后旗的二兰虎沟等地的墓葬中，均有出土。

匈奴人的原始信仰，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人每年祭其祖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蹛音dài），“课校人畜计”。在这三次集会中，有两次都是祭祀的集会。但据《东观汉记·南匈奴单于传》载：单于每岁祭三龙祠，并走马、斗骆驼为娱乐。《后汉书·南匈奴传》也载：匈奴之俗，每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因会诸部，商议政事，并走马及骆驼为娱乐。是则匈奴每年的三次集会都有祭祀，祭祀的对象是祖先、天地和鬼神。

三 匈奴政权的建立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匈奴人很早就组成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匈奴的氏族贵族及其世袭权力开始逐渐抬头，至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时，便最终地作为一种制度而确立了。《史记·匈奴列传》载冒顿自立为单于之后，往往独断专行，有时甚至把和他意见相反的部落首领杀掉。同时，单于还对各个部落首领发号施令，命令他们出征，有后至者斩。像冒顿单于这种权力，显然不是原始社会部落联盟首领所能具有，这时，他已十足地是一个阶级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了。

在冒顿单于时期，匈奴控地已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在我国北方，以漠北为中心，一个庞大的奴隶制政权便建立起来了。

匈奴政权机构分三部分：

一是单于庭（首脑部），它直辖的地区在匈奴中部，其南对着汉地的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和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

二是左贤王庭（东部），它管辖的地区在匈奴东部，其南对着汉地的上谷郡（今河

^① 参阅《汉书·匈奴传》、《后汉书·耿种传》及《后汉书·西域传》。

^② 《胡笳十八拍》是否出于蔡文姬的真笔，现时学术界尚有争论。

北怀来县一带)东面连接涉貉(huì mò),

三是右贤王庭(西部),它管辖的地区在匈奴西部,其南对着汉地的上郡(今陕西榆林县一带),西面连接月氏和氏羌。

早在公元前265年(赵孝成王元年)前后,匈奴奴隶主操纵下的骑兵,就不时南下入侵赵国的边境,以致边民不能田耕和畜牧。后来赵王派李牧将兵抵御,大破匈奴十余万骑,从此匈奴不敢侵入赵国的边城。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公元前215年(始皇三十二年),以头曼单于为首的匈奴奴隶主势力复南下侵扰,始皇乃派遣蒙恬将兵三十万进行反击,夺取了“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盟一带),迫使匈奴向北退却七百余里。为了巩固北部的边防,始皇三十三年,又把原先燕、赵、秦三国在北方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重新修缮,并东西扩展,筑成“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沿黄河北至河套,傍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东至辽东(今辽宁辽阳县西北),延袤五千余里,并使蒙恬拥兵坐镇上郡(秦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县东南),以为守卫。公元前210年(始皇三十七年)蒙恬死,翌年而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秦王朝瓦解,戍卒逃散,北边空虚。于是匈奴奴隶主又乘机复渡河南(河套以南),与中原旧时的障塞分界。

西汉初期,正是匈奴奴隶主势力空前强大的时期,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控弦之士”(骑射部队)三十余万众,不断向邻族实行侵扰。他利用当时楚汉相争、中原内乱的时机,南越长城,侵扰现今的冀北、山西、陕西及河套一带,给予刚刚建立的两汉王朝以莫大的威胁。

汉初,由于中原地区社会经济残破,劳动力不足,国力空虚,故不足以抗拒匈奴。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秋,匈奴大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驻守马邑的韩王信投降匈奴。匈奴遂引兵南下进攻太原,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下。七年(前200年)冬,高帝亲自将兵前往抵御,冒顿发精兵四十万骑围之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

东)的白登山七日,汉兵内外接应被切断。后用陈平之计,使人暗中以厚礼疏通冒顿的阏氏(匈奴语妻的意思),乃得脱围。于是乃使刘敬前往匈奴结和亲之约。此后,和亲成为西汉王朝初期对待匈奴的一种政策。为了执行这种政策,汉朝曾付出巨大的代价:以公主嫁给单于为阏氏;另每年奉送一定数量的絮、缯、酒、米、食物。此外还开“关市”。

但是,公主、财物和开关市并不能满足匈奴奴隶主的贪欲,因而汉朝虽忍受了巨大的牺牲,仍不能获得边境的安宁和汉人生产、生活及财产的保障。当时的陇西、北地、上郡、云中、上谷、辽东等郡(当今甘肃临洮、庆阳、陕西榆林、内蒙古托克托、河北怀来、辽宁辽阳一带),经常遭到骚扰。奴隶主操纵下的匈奴骑兵,所到之处,蹂躏庄稼,劫夺财产,杀略吏民,抄掠人口,把大量汉人俘为奴隶,单是云中、辽东,每年每郡被杀和被虏去的人口就有一万多人。故武帝在国力充实、足以抗拒匈奴的时候,便采取积极防御的战争方针以代替消极的和亲政策,完全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

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开始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经过元狩二年及四年(公元前121及119年)两次带决定性的战役,匈奴都大败,右地浑邪王率领四万余人投汉,单于及左贤王亦皆遁走,河西走廊平定。匈奴主力不得不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从此“漠南无王庭”。东线方面,汉朝在夺得了匈奴左地之后,扶植原来役属于匈奴奴隶主的乌桓族侦察匈奴的动静,这样便切断了匈奴的左臂。同时,汉朝还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大宛以公主嫁给乌孙王(时乌孙驻牧于今伊犁河上游流域),拆散了匈奴与西方的同盟,以切断匈奴的右臂。又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一方面用以隔绝匈奴与羌族(生活于今青海一带)的交通,另一方面也便于在河西及上郡、朔方、西河等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一带)实行屯田。此外还加强了边防的设备,把烽燧、亭障从酒泉伸展到玉门,又从敦煌伸展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经过这一系

列的军事、政治、边防和经济上的措施，匈奴奴隶主的威胁才基本上解除。

四 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

东汉初期，匈奴奴隶主侵扰势力重新抬头，他们一方面与新兴的鲜卑族（游牧于今东北的西拉木伦河流域）连兵入寇，同时又勾结和支持中原的地方割据势力，如盘据今宁夏固原北的卢芳，今河北蔚县西南的张晔，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的彭宠，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的李兴，直接参与中原的分裂活动，阻碍中国统一，破坏封建制度，企图扩大割据势力。

当时东汉政府初建，全国尚未统一，经济萧条，边塞空虚，在战略上无力积极反攻，只能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和策略。以致当时的上党（东汉初治长子，今山西屯长县西南）、扶风（治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天水（治平襄，今甘肃通渭县西北）、上谷（治沮阳，今河北怀来县东南）、中山（治卢奴，今河北定县）各地，都遭到匈奴骑兵的骚扰。

与此同时，匈奴统治者还从西域各族人民中勒索赋税，以增强经济实力。由于敛税苛刻，剥削惨重，各族人民无法忍受。建武中，西域各族政权先后派遣使者至东汉政府请求内属，并请在西域设置都护。但光武帝以中原初定，匈奴未服，无暇顾及中原以外之事，竟未允许。

公元48年（建武二十四年），驻牧于匈奴之南、管领南边八部之众的右奥鞬日逐王比（西汉宣帝时因匈奴内部变乱而投归汉朝的呼韩邪单于之孙，名比），因不得立为单于，遂生愤恨，率领所属部众四、五万人，归附于汉，自立为醯落尸逐鞬单于（醯音xi）。以其祖父呼韩邪单于尝依汉得安，故袭用“呼韩邪”的称号，仍称为呼韩邪单于，重新接受中原中央王朝的统一领导，于是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两部。公元50年（建武二十六年），汉朝中央政府派遣中郎将至南匈奴，帮助比设立单于庭帐（南庭）于五原西部塞，随后又让他入居西河郡的美稷县

（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

公元65年（明帝永平八年）秋，北匈奴的侵扰势力进攻河西诸郡，焚烧城邑，杀略甚众，以致河西城门昼闭，人民受害不浅。公元72年（永平十五年），北匈奴又寇河西，而且胁迫西域各族随同入寇，翌年又寇云中及渔阳。

东汉政府鉴于北匈奴奴隶主侵扰势力的存在及其不时骚扰，对于汉族及中原封建社会的向前发展，始终是个莫大的威胁。故随着中原政治局面的统一，社会经济的恢复，汉朝国力的加强，及在南匈奴的积极支持下，于是在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命诸将率同南匈奴等骑，共数万人，四道出塞北征。这次出征，除了窦固西出酒泉一路，在天山（在今新疆吐鲁番城北）击败呼衍王部，追至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占据了伊吾卢城（今哈密县）外，其余三路都因北匈奴闻风逃往漠北，没有战果而还。

自东汉初以来，北匈奴奴隶主即加强对西域的控制，这时更派遣使者常川驻在于阗国内监督，并从于阗人民中每年征收鬲絮等物资。北匈奴还利用西域东部如车师等国的丰盛水草地带，派遣呼衍王部驻牧于天山、蒲类海一带，这非但阻塞了汉与西域的交通，而且造成对河西走廊的直接威胁。所以永平十六年北征时，另以窦固一路专门西击天山的呼衍王部；同时派遣班超经营西域。班超很快就平定了于阗等南道诸国，于是西域自与汉朝断绝关系六十五载，现在乃复沟通（西域自王莽始建国元年与汉绝，至永平十六年复通，当公元9—73年）。永年十七年春，班超复平定北道的龟兹（音qūicī）。同年冬，窦固将兵再次击破呼衍王部于蒲类海，并占领了车师。汉朝中央政府遂在西域设置都护及戊己校尉，都护及戊己校尉屯车师后王部金蒲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己校尉则屯车师前王部柳中城（在今吐鲁番东南的克鲁沁），用以镇抚西域，捍御北匈奴。北匈奴当然不肯轻易放弃西域，随即对汉实行反攻，因此汉匈之间，在公元75—76年（明帝永平十八年及章帝建初元年）展开了一场对西

域的争夺战。时值中原地区大旱、谷贵，人民负荷不堪，于是东汉征伐北匈奴的战争一时中止。后来由于北匈奴发生了危机：平时受到它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乘机起来进行民族反抗，“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①；北匈奴的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纷纷南下归附汉朝，同时漠北发生了蝗灾，人民饥馑；统治阶级内部又兄弟争立，各部分势力并各离散。于是公元89年（和帝永元元年）东汉政府再次出兵，在汉将窦宪、耿秉与南单于联军的夹攻下，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今漠北西北部的额布根山），北单于遁走，斩首俘获甚众，先后接受归附的计八十一部合二十余万人，汉兵追及燕然山（今杭爱山）而还。翌年（永元二年）又派兵与南匈奴共出鸡鹿塞（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后旗西）再击北匈奴，北单于受伤遁逃，仅以身免。公元91年（永元三年），汉复

大出击，耿夔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北单于率领一部分人众逃往乌孙（在今伊犁河上游流域），后转徙康居（今中亚哈萨克斯坦东南部）^②。匈奴奴隶制政权全部瓦解。从此匈奴退出了漠北地区。从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建立政权起算，匈奴在大漠南北活跃，至此整整三百年。

南匈奴附汉之后，入塞居住，此后不断内徙，及至汉末，大多数已深入集中到今山西省汾水流域一带。西晋初，以刘渊、刘曜为首的匈奴贵族，在山西及陕西建立了“汉——前赵”政权（公元304—329年），开始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

① 《后汉书·南匈奴传》。
② 《后汉书·南匈奴传》及《后汉书·窦宪传》俱云：“北单于逃亡，不知所往。”但《后汉书·袁安传》则云：“北单于遁走乌孙”，当是事实；后转移康居，见《魏书·西域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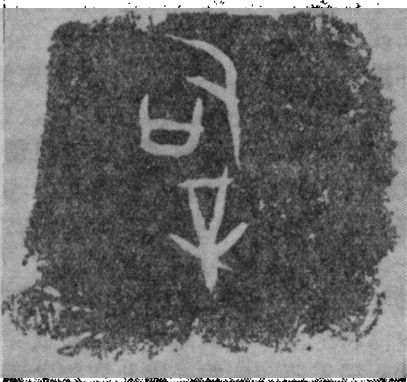
· 封面图片说明 ·

「司辛」石牛

商（公元前十六—前十一世纪）高一四、长二五厘米
一九七六年河南安阳商「妇好」墓出土

商代手工业在农业发展基础上有了新的成就。从考古材料中可以看到，城市的手工业作坊分工精细，当时已有铸铜、制陶、制骨、玉石业、漆木业等部门。玉石器的雕刻技术，有浅刻、深刻、浮雕、立体或半立体雕以及镂空雕等。其成品除了奴隶主贵族专用的璧、琮、环、瑗、玦、琮、圭、璋、璜、管等各种礼器及饰物外，还有作为礼乐器的殷、豆、盘、皿、尊、罍、俎、簠、簋等器具和作为仪仗用的戈、矛、钺、斧、戚、刀等兵器，另外还有玉人雕像和各种大型的白玉雕塑品，都十分精致。

一九七六年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的一座商代王室墓葬，出土青铜器、玉石器等珍贵文物一千余件。「司辛」石牛就是其中一件。石牛用大理石雕刻而成，作伏卧状，前肢跪地，后肢前屈，尾下垂，昂首，张口露齿，两角向后，眼、耳、鼻线刻均清晰，以云纹表示身体各部位。下颌阴刻「司辛」二字（见拓片）。



此墓出土的大量铜器，多有「妇好」或「司母辛」铭文，此石牛上刻「司辛」，可能是「司母辛」的省略。根据甲骨卜辞记载，商王武丁的三个法定配偶中，有一个谥号叫「妣辛」的，即商王祖庚、祖甲时卜辞所称的「母辛」，从出土铜器和石牛等器物铭文，结合甲骨文记载，推断此墓主人为「妇好」，即祖庚或祖甲之母「妣辛」。「妇好」是本人活着时的「生称」，「辛」是死后的谥号。妇好在商王武丁时期，是一个带兵作战的女奴隶主，她的一切活动都是为着巩固和维持奴隶制国家和奴隶主的特权，故其死后，随葬器物极为豪华。这件「司辛」石牛是妇好之子祖庚或祖甲所作，把它作为随葬品，以象征用牺牲祭祀亡母，故刻「司辛」二字。

石牛雕刻精致生动，线条刚劲有力，体现了商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技巧，是古代大理石雕刻的艺术珍品之一。

（吕树芝）